



· 外国哲学 ·

规则与标准

——重析休谟“趣味标准”的双重内涵*

陈 昊

〔摘 要〕休谟“趣味标准”理论中蕴含的“规则”与“标准”的双重内涵，体现了这位思想家对于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洞察，同时这两重内涵之间的理论张力也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休谟既敏锐地看到个人趣味中偶然而主观性的一面，同时又乐观地相信自然健全的人性与社会历史的进步会逐渐改善人们的趣味。后世对于这一问题的种种争鸣，一方面丰富了休谟的思想，另一方面折射出了时代文化的不同发展、弊端与诉求，对于我们现今的社会文化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休谟 规则 标准 趣味 〔中图分类号〕B83-09

18世纪英国思想家大卫·休谟的《论趣味的标准》一文，历来被视作西方美学论著中的名篇，“趣味标准”这一论题包含的丰富意蕴，更是引发后世不断研究解读的焦点。詹姆斯·谢利（James Shelley）指出，休谟的“趣味标准”实际上包含两重内涵：人性普遍的规则以及批评家共同建立的标准。“规则”蕴含了某种理想的审美观念，而“标准”是人们见贤思齐，在现实生活中的模仿对象，两者于观念和实践两方面共同组成了趣味的标准。（cf. Shelley, pp. 437-445）休谟认为，趣味是个人印象与观念的结合，其形成和作用均受到人性“规则”（rule）的规范。所谓“规则”，休谟认为其并非先验的规条，而是长期经验和习惯的产物，形成人们心理上的一种趋向和期待（expectation），进而影响人的趣味与感受；另一方面，规则使得个人的情感与趣味有迹可循，有助于人们理解和反省自身的趣味，但并不能教导人们在趣味之间如何褒贬取舍，这就需要社会文化凝练成的“标准”对大众趣味加以引导。本文尝试延续这一思路，厘清休谟提出的“趣味标准”的具体内涵，并由此探讨休谟经验主义美学思想的优长与问题。

一、人性的规则

休谟在《论趣味的标准》一文开篇明义，强调虽然世界上存有形形色色的趣味，但人们仍然希望建立某种“趣味的标准”：“所以很自然地，我们想找到一种趣味的标准，一种足以协调人们不同情感的规则；至少，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判别的准则，可以使我们肯定一种情感，指责另一种情感。”

* 本文系2014年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情感与趣味——大卫·休谟美学思想研究”（编号14YJC720001）的阶段性成果。





(休谟, 1987年, 第143页)

在这段文字中, 我们看到休谟将“趣味的标准”定义为“一种足以协调人们不同情感的规则(rule)”。值得注意的是休谟笔下的“协调”(reconcile)一词, 其涵义与我们的日常用法稍有差异。在休谟眼中, 人们形形色色的情感体验虽然同样发自肺腑、真实无伪, 但并非没有高下对错之分, 因此需要对“趣味的标准”加以判别。杰弗里·维安德(Jeffrey Wieand)指出, 休谟这里的“协调”并不是意在消除差异与争执, 而是确立某种去粗取精、衡量高下的规则。(cf. Wieand, p. 131)

休谟身处在高扬理性的启蒙时代, 美学史家吉尔伯特和库恩将这一时期的美学倾向概括为“理性的统治”: “任何人都得服从理性的裁决。在某种意义上讲, 理性的统治再次给世界带来了某种秩序性和内聚力。”(吉尔伯特、库恩, 第308页) 休谟正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中提出了“趣味标准”的理论, 他认为形形色色的趣味虽然都出自个人的真实体验, 但仍然需要某种规范与引导。休谟这篇文章的发表, 无论是时间还是内容, 都与“美学之父”鲍姆嘉通发表的《美学》遥相呼应, 而休谟对“趣味标准”的探讨, 也正涉及“感性认识的完善”等问题。

休谟对当时社会中趣味的种种差异进行了详细辨析, 他指出趣味的分歧来自于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氛围、宗教信仰, 以及个人的感官素质和知识积累的差别, 因而需要艺术法则、道德规范、批评标准等种种规则来加以衡量评判。休谟秉持着他一贯的经验主义立场, 在他看来, 趣味的标准与审美的体验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艺术创作的种种法则, 不是靠先天的推理来确定的……它们的根据同一切实用科学一样, 都是经验: 它们不过是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度和时代的人们快感的概括”。(休谟, 1987年, 第146页) 换言之, 在休谟眼中, “规则”并非某种先天的教条, 实际上是在历史文化的积淀以及人们的反思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鲍桑葵在《美学史》中写道: “休谟比夏夫兹伯里更明确地、比哈奇生更明白得多地提出了一项重要观念: 趣味虽然纯粹是一种感受, 却可以同快感和不快感一起受到一定性质的结构和关系的影响, 可以由思考力加以分析。”(鲍桑葵, 第237页) 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休谟对于传统经验主义偏重主观感受之弊的矫正。休谟试图借助理性的辨析与反思, 在千奇百怪的趣味取向中去粗取精, “使我们肯定一种情感, 指责另一种情感”。克里斯托弗·威廉斯(Christopher Williams)在将《论趣味的标准》一文的主旨提炼为休谟对两个问题的自问自答: 第一, 纠正人们形形色色的趣味是否可能; 第二, 艺术是否有高下之分, 是否有一种标准来区分艺术的优劣? 克里斯托弗·威廉斯指出, 在休谟的这两个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 休谟回答其中一个问题的答案有可能与他另一个问题的回答相矛盾。要对第一个问题得出肯定的答案, 就必须承认“趣味”虽然有高下之分, 却是一种人皆有之的禀赋和能力, 能够通过理性的反思以及文化的熏陶得到改善。但如此一来, 艺术评判的客观标准就被取消了, 因为鉴赏审美的评判权完全操诸个人主观了。(cf. Williams, pp. 78-90)

威廉斯的这一质疑, 实际上休谟在文中已经作了回答。正如休谟自己所指出的, 艺术的种种法则, 并非某些“永恒不变的观念和关系”, 而是对于人们实际经验的浓缩概括。换言之, 只有真实的经验, 才是衡量趣味的真正准则。休谟改写了塞万提斯的名作《堂吉珂德》中的一个小故事, 以此说明自己对于“趣味”的理解。在这一故事中, 桑丘的两位亲戚具有杰出的品酒才能, 在一次品酒过程中, 他们指出一桶陈年好酒中存有异议, 一个说酒中有皮革味, 一个则说酒中有铁锈味, 因而招来了众人的嘲笑。结果酒喝完之后, 人们在桶内发现一把拴着皮带的旧钥匙, 两位品酒家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赞誉。(参见休谟, 1987年, 第150页)

休谟引用这一故事, 其用意也很明显: 酒的好坏标准是在评鉴的过程之中形成的, 人们在品酒的过程中锻炼了自身的感官, 因而也形成了评判的规则。实际上在塞万提斯的原著当中, 这两位品酒专





家只是尝出了酒里的异味，却没有得到人们最后的赞誉。（参见塞万提斯，第95页）休谟的改编，意在强调虽然口味因人而异，但仍然存有某种衡量的标准，就如同酒桶底部的钥匙一样，其存在无可置疑，意味着审美趣味中的客观性与普遍性。正如休谟所说的：“虽然美和丑比起甜与苦来，可以更加肯定地说不是事物本身的性质，而是完全属于内外感官感觉到的东西，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对象本身必有某种性质，按其本性是适于在我们的感官中引起这些感受的。”（休谟，1987年，第151页）

休谟指出，虽然世间存有形形色色的趣味，而且人们对自己的趣味大多敝帚自珍，因此需要规则的指引与衡量，这样的规则能够将人们的快感与对象的某些性质准确地联系起来，因而可以解决趣味中的争端，就如同酒桶底的钥匙一样。但是审美鉴赏的趣味较之味觉的体验更为复杂精细，这一把趣味的“钥匙”虽然仍然存在，却更难呈现在大众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具有良好趣味的人不仅能够独乐其乐，同样应该将审美趣味加以“条理化，归纳成一般原则”（同上，第152页），并将其传播到更广阔的社会范围中去。休谟强调，若要提升他人的趣味，单纯的教条灌输是毫无效果的，唯一的捷径是将他人同样承认的艺术法则展现在他的眼前，指出“这条法则可以运用到当前的事例上，而他现在还没有觉察到它的作用和意义”。（同上）

休谟的“规则”意指人类印象与观念的联系规律，这种规律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人们从实际经验中提炼得来，是人类经验不断累积的结晶。“规则”的目的在于“规范我们的思辨，同时也规范我们将来的行为，我们在长期生活和各种事务、交际中获得的经验，也有同样的益处”（休谟，2010年，第214页）。换言之，“规则”不仅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经验与认识，同时预测引导着我们未来的行为。休谟认为，个人的情感变化无常，常常会受自身的阅历和环境的变化影响，因此有必要确立某种“一般的准则”，使人们在各种刺激面前能够保持心灵的平和以及情感的适度。“当习惯和实践一经把这些原则显示出来，并且确定了每种事物的正确价值以后，那就必然有助于情感的顺利产生，并且依据一般确立的准则，指导我们应当依照什么比例去选择一个对象，而舍弃另一个对象。”（休谟，1998年，第328页）

休谟的这段论述还包含有另一个意思，即人性的规则并非所有人都生而知之，大部分人需要经过长期的习惯和实践方能认识，同时其稳定平和、合乎中道的价值也只有经过反复经验后才能为人所确定。换言之，如果没有长期的实践和锻炼，规则非但不会产生深入人心性的影响，反而会因为经验的缺失，在人性中失去立足之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规则一方面是经验的积累的结晶，另一方面同样包涵着人们有意识地根据自身经验和情感，针对某些目的，对规则有意识地加以设计与利用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规则的建立和影响都带有社会公益的性质，因为其在建立和发生作用的过程中，自然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达成共识的行为。（参见同上，第569页）在休谟眼中，情感与趣味都是人性规则的产物，两者并非个人随意的反应，而是有迹可循的经验结晶。然而规则更多属于人性的一种自然倾向，因而并不能代替标准（standard）即社会文化熏陶规范的作用。一味盲从规则同样会形成思维的定式，进而导向谬误与偏见。（参见同上，第411页）休谟坚持，经验本身就是纠正规则之谬误的对症良药，在这个过程中，外在的迷信与权威均不足恃，我们只有经过更加广泛的实践与尝试，以及理性的反思，充分意识到人性规则的局限，并且主动地选择或树立某种规范的标准，如此方不至于沦为感官以及“规则”的提线木偶。

休谟以《堂吉珂德》中品酒的故事为例，指出品酒家之高明不仅在于鉴别酒的甜酸口味，而且在于鉴赏酒的各种口味是否协调和谐，这正是品酒家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规则”。同时，规则



并非一成不变，人们在反复的体验和欣赏过程中构成了某种规则的观念，将自己的快感好恶与外在世界的种种经验印象联系了起来。随着经验的累积和环境的变更，这种观念也随之成熟改善，并且越来越具包容性，能够涵盖更多复杂的元素，其应用的范围也愈加广阔。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休谟的“规则”与“标准”概念，既具有普通意义上的感官与心理意味，同时也包括更加广泛的社会文化内涵。

二、批评家的标准

休谟笔下的艺术“规则”，即是人们审美经验的积淀。休谟认为个人的趣味也许会因为感官和文化的种种原因而参差不齐，但如果将趣味置于历史的长河中，“一个文明的民族……在喜欢某个珍贵的史诗或悲剧作家方面决不会长久地陷于错误”。（休谟，1987年，第163页）

休谟虽然在文中对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趣味论之甚详，但他的意图并不是宣扬“趣味无争辩”的自由主义。休谟认为，天地虽大，社会虽广，但为我们喜爱欣赏的，总得是美好和谐的事物，总得能够与人的爱与美之本能相协调；如果明知其为丑恶，即使能够一时刺激满足感官的需求，但作为一个文明道德之人，终不能饥不择食，以等而下之的丑恶之物来自娱，而需要某种标准的规范与引导，这就关系到人的品格与社会文化氛围。休谟因此将建立“趣味标准”的任务交给了某些“理想批评家”，他们具备精细的感官、健全的理智、广泛的艺术实践与比较，同时不盲从于权威，不趋附于流俗，能够破除世俗的种种偏见。休谟在“理想批评家”身上寄托的不仅是个人素质的改善，而且包含了对于某种社会改良的期望。

休谟之所以将趣味的标准问题转移为批评家的标准问题，原因在于：只有树立了这些有迹可循的实践标准，才可以培养出真正的批评家，这些真正的批评家可以引导人们建立真正的趣味。休谟的这种做法源自于他对趣味的理解：趣味既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感官，又是受文化熏习的优雅习性。而具有理想趣味的批评家们则肩负着引导和改善整个社会文化风尚的责任。休谟指出，建立趣味标准的意义不在于使我们依赖于某些专家的意见，而是发掘自己的理性力量。这与康德在《何为启蒙》一文中的观点不谋而合：“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康德，第23页）

实际上休谟和康德都看到了这种启蒙理论的理想色彩与其实际上的可行性之间的差距。康德在这篇文章稍后指出：某些知识精英固然可以激发群众的思想启蒙，但另一方面，这部分先行者灌输的意见也许会成为新的偏见。（参见同上，第24页）而休谟则从另一角度尝试避免这一弊端，他指出建立趣味标准的关键在于：一方面需要从正面建立标准，比如从“理想的批评家”入手；另一方面，需要在形形色色的趣味中，辨别出哪些是“无可指责的”（blameless）“异见”（disagreement），哪些是需要摒弃的个人偏见。在休谟看来，比起既定的金科玉律，人们切磋琢磨、见贤思齐的交流才是趣味标准这一理念的精髓。

休谟强调了两点造成“异见”的因素：个人的性情气质，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熏陶。在休谟看来，历史文化因素既有历时性的（不同时代的审美风尚），又有共时性的（不同国家地域的传统文化风气）：“同样理由，我们在阅读当中总是更喜爱那些类似我们时代和国家的描写和人物，对体现不同风俗的描写和人物则比较冷淡。”（休谟，1987年，第166页）在休谟眼中，理想的批评家不仅仅要纠正个人的偏见，更要克服文化造成的偏见：“另一个时代和国家的批评家在读到这篇演说词时，就应该注意到当时这一切情况，应该设身处地想想他所面对的听众是怎样的，才能对这篇演讲作出正确的判断。”（同上，第157页）这种包容性是理想批评家应该具有的素质，同时更加体现了趣味标



准的多元和宽容的特征。

在休谟眼中，审美趣味不仅是一种感官的直接体验，更是一种人文意识的活动。趣味的感知与判断，跟批评家个人意识的发展息息相关。一个人的知识、经验、生命情调，无一不是趣味的主要凭籍。有论者认为休谟陷入了循环论证的误区：他究竟是将“理想的批评家”作为基础来推导出可靠的审美趣味，还是以可靠的审美趣味为基础推导出“理想的批评家”，这两者究竟谁为前提，谁为结论？（参见布罗迪，第289页）实际上休谟在文中已经回答了这一质疑，他指出人类文明中存在有某些经典的艺术作品，由此推出这些作品之所以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正是由于历史上具有一批健全趣味和良好鉴赏力的人们，正是他们共同的审美经验树立了这些经典。

保罗·葛耶（Paul Guyer）指出，我们个人的感受只关乎自己，但是如果要把一个民族和社会的集体审美感受延续下去，这就非批评家不可，而且这里的“批评家”并不是一种理想的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人。批评家的意见不仅仅在培养人们健全的审美能力，更是一种对普通人的持续同化。（cf. Guyer, pp. 37-76）休谟看到普通人都具有融入社会的天性，这就使得他们会自发去寻找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人，咨询他们的意见，以此来构建并融入社会文化。

休谟强调趣味的普遍性与一致性，但并非某种死板的规范或教条，他更看重“趣味标准”中蕴含的社会交流理念。阿诺德·豪泽尔在《艺术社会史》中写道：“在那个时代，英国社会的平均化比其他地方走得更远……市民阶层必须积累和巩固自己的财富，为自己日后要扮演的精神领袖的角色打下基础。贵族阶级最终也得从市民阶级的世界观中汲取点东西，以便和市民阶级组成一个统一的文化阶层。”（豪泽尔，第300页）“这种新的文化取向，既非贵族趣味也非大众趣味，它有着严格的理性主义，也具备严厉的道德观和人格理想。”（同上，第301页）贵族阶层理性审慎的风格，与市民阶层自然而直抒胸臆的品味，两者之间最终达成了交流、妥协与融合，这与当时英国的社会政治氛围颇有暗合之处。

然而，当代西方学界对于休谟的解读研究往往执其两端，或热衷于休谟“趣味标准”理论中的精英化倾向，将其引申为某种社会阶级的特权与压迫，或强调普罗大众易于盲从权威、人云亦云的人性弱点。两种研究倾向反而与休谟启蒙人性与促进社会沟通的理想背道而驰，这不能不说是休谟“趣味标准”理论引发的又一有趣问题。

前种研究方向中，特德·科恩（Ted Cohen）的意见颇具代表性：休谟所论述的趣味具有两层不同的含义：其一是对于细微感受的辨识能力，另一则是对于事物的偏好，这两层含义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联系，换言之，由精细的感官无法推出必然的偏好，更无法确定趣味的高下优劣。（cf. Cohen, pp. 167-173）布尔迪厄在他的《区分》一书中更是强调：趣味并非纯粹的自然感受，而是社会文化与经济资本相互作用而生的产物。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而这一分类的构成、标示和维持，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外衣。（参见布尔迪厄，第31页）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进一步指出，休谟借助“趣味标准”来褒贬艺术，实际上这是“中产阶级”的一种阴谋，是中产阶级借以提升与巩固自身社会地位的手段。（cf. Shusterman, pp. 211-229）

大卫·维金斯（David Wiggins）指出，无论审美判断还是价值抉择都不可避免地属于个人主观的认定，但主观的认定不能赋予它任何客观的价值，因此无论那些批评家具有什么样的主观条件，最终支撑其地位的仍然是一种普遍人性的“规则”。维金斯最终得出一个颇为现实的答案：我们之所以需要“批评家”，在于他们能够给艺术品贴上一些易为大众所能识别和欣赏的“标签”，人们总是倾向去相信“规范”、“传统”以及“专家”。因此批评家们达成一致的评判塑造了大众的趣味。（cf. Wiggins, pp. 185-214）



结 语

休谟的美学理论植根于他独特的经验主义哲学立场，他强调个人主体的经验意识中就包含了规范引导自身的“规则”，由此批判了传统西方美学中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是西方美学史上的一大突破。但是这一创见也有着自身的缺陷：休谟将个人经验视作自己理论的落脚点，而这一基础并不坚实。这种经验论思想过分强调个人的经验和信念，因而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相对主义，最终导向怀疑论。在这一点上，康德批判并发展了休谟的学说。另一方面，休谟同样看到了自己理论中偏重个人经验的问题，因此引入了社会文化方面的“标准”来加以完善和平衡。但是休谟对于“标准”的理解，较多偏重于权威的灌输与熏陶，以及历史文化传统与时代地域差异，他强调这些“常识”才是趣味标准的前提，而在“从来如此”的事实判断到“应当如此”的价值判断之间，休谟多少有些模糊了两者间的区别。尽管在理论上存有一些缺陷，但休谟“趣味标准”学说中蕴含的“规则”与“标准”的双重内涵，体现了这位思想家对于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洞察。休谟是一位心怀启蒙的思想家，他的“趣味标准”只是反对人们以自由解放的名义行反智纵欲之实。沟通与自省，始终是他的首要原则。在现今文化多元的社会中，我们也许更加需要休谟这种审慎而实际的智慧。

参考文献

- 鲍桑葵，1983年：《美学史》，张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布尔迪厄，2015年：《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
- 布罗迪，2004年：《苏格兰启蒙哲学》，三联书店。
- 豪泽尔，2015年：《艺术社会史》，商务印书馆。
- 吉尔伯特·库恩，1989年：《美学史》，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康德，2002年：《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 塞万提斯，1995年：《堂吉珂德》下册，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 休谟，1987年：《人性的高贵与卑劣——休谟散文集》，杨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 1998年：《人性论》，关文译，商务印书馆。
- 2010年：《论道德原理·论人类理智》，周晓亮译，译林出版社。
- Cohen, T., 2004, "The philosophy of taste: thoughts on the idea", in P. Kivy (ed.), *Blackwell Guide to Aesthetics*, Blackwell.
- Guyer, P., 2005, "The standard of taste and the 'most ardent desire of society'", in P. Guyer (ed.), *Values of Beau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elley, J., 1994, "Hume's double standard of taste", in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 4.
- Shusterman, R., 1989, "Of the Scandal of taste: social privilege as nature in the aesthetic theories of Hume and Kant", in *Philosophical Forum*, Vol. 3.
- Wieand, J., 1984, "Hume's two standard of taste", i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34.
- Wiggins, D., 1998, "A sensible subjectivism?", in D. Wiggins (ed.), *Needs, Values, and Truth*, Clarendon Press.
- Williams, C., 2007, "Some questions in Hume's aesthetics", in *Philosophy Compass*, Vol. 2.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孟宪清